

巴金和他的同时代人

徐开垒

革命文丛

徐开垒

学林出版社

巴金和他的同时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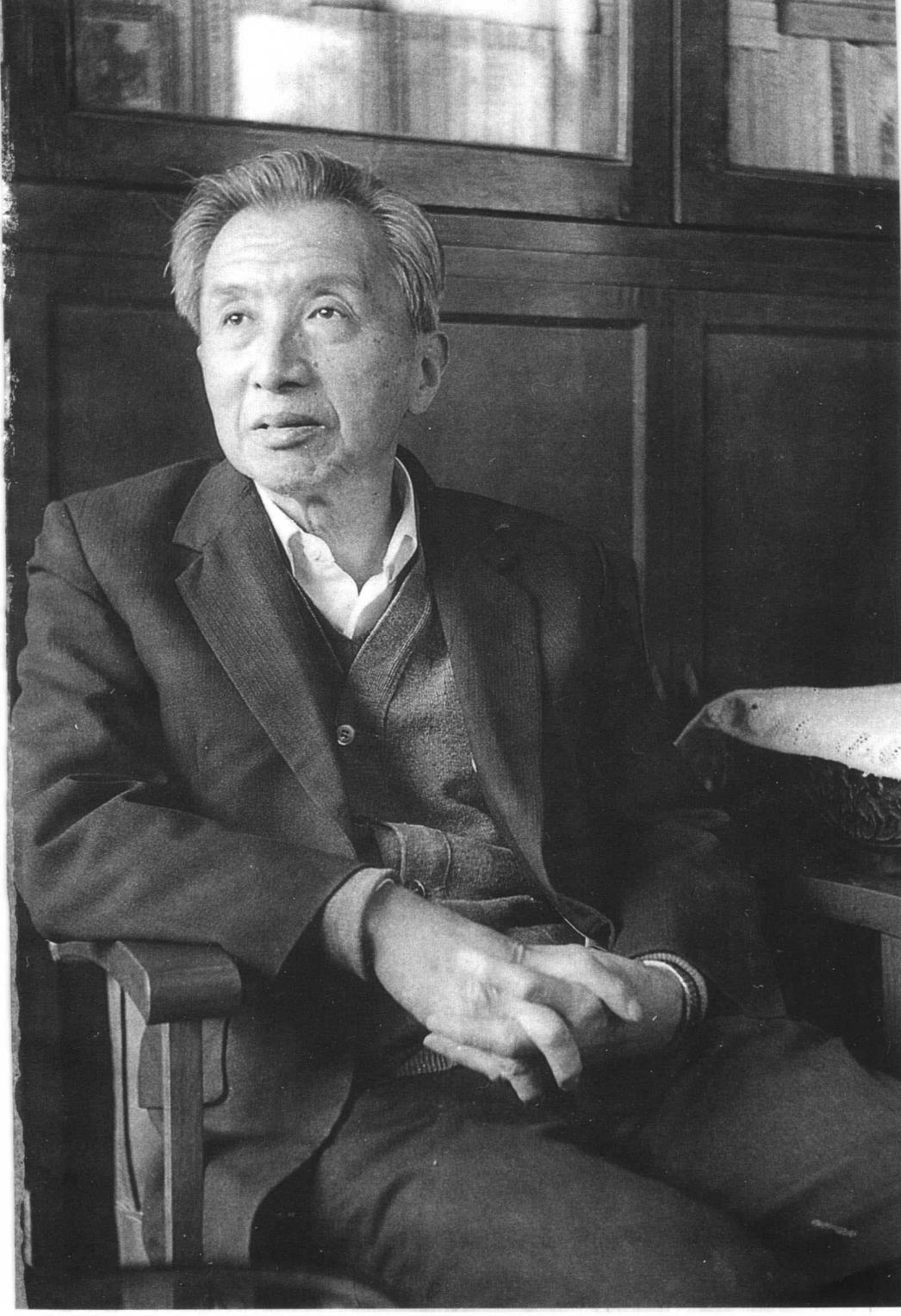


笔会文丛

巴金和他的同时代人

徐开垒

主 编 萧关鸿 曹维劲
责任编辑 徐智明
封面设计 陶雪华
版式设计 应黎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发 行 上海书店 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 × 1168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4 万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7-80616-624-6/I · 221
定 价 19.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 3 巴金和他的同时代人
- 22 巴金的家庭和他的青年时代
- 39 巴金，我的前辈和老师
- 45 记日本作家在巴金家里作客
- 50 在巴金先生家中
- 53 巴金的希望之火
- 60 作家靠读者养活
 - 关于传记及某些文艺现象与巴金对话
- 71 探望巴金先生
- 81 《随想录》的先声
 - 巴金 1956 年的杂感和 1962 年
在上海文代会上的发言
- 87 新年喜述巴金近事
 - 遥寄曾敏之
- 91 我写《巴金传》
- 98 从“呼号”到“随想”
 - 《巴金美文精萃》序
- 105 喜看《家·春·秋》上荧屏

第二辑

- 111 长者叶圣陶
119 和冰心前辈一席谈
128 我的“最后一课”老师王统照
136 回忆子恺先生
149 追怀沈尹默老人
158 郭绍虞先生的德行
161 柯灵，“千夫”指下的孺子牛
175 把灾祸化作学问
——祝贺柯灵写作生涯六十年
183 曹禺在舞台背后
191 泪洒大堰村
——在王任叔墓前
197 “滴尽了油的板鸭”
——怀念魏金枝
202 关于钱钟书先生
——寄给一个朋友
205 徐迟不会自愿离开我们
214 我的母校校长何炳松
220 饮茶粤海忆萧殷[附：访欧阳山]
229 欲说还休念吴强
233 不悔的孙大雨
236 作家们的家

第三辑

- 目**
录
245 师教

目
录

- 251 第一本课外书
- 255 读鲁迅散文的回忆
- 260 真挚的感情是最有力量的
——谈王西彦的散文
- 271 蕴藏不露的杨绛散文
- 274 前辈作家怎样在散文中写人
- 288 艺术的生命力长存
- 294 宁波,我的母亲
- 301 和相交半世纪的“老朋友”谈心
- 307 难忘的抗战八年
- 316 “孤岛”文学的主要阵地
- 329 从《世纪风》到《笔会》
- 345 在我的书橱里
- 349 我写的书和几个责任编辑

第

—

輯

巴金和他的同时代人

1997年9月，我在中国作协、中国文学基金会、苏州大学联合召开的第四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会上，曾就“巴金与他的同时代人”这一专题作过即席发言，因当时时间匆促，未及畅所欲言，现在半年过去，我觉得我有必要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思考。

我认为巴金出生在1904年，他的一生，可说经历了20世纪的全过程。他是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几乎没有一篇不打有20世纪的烙印。他和他的同时代人，特别是和他有交往，并有过较深友谊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某些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巴金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人本身的经历，尽管各有各的特点，却无不与20世纪的艰难同其艰难，与20世纪的悲欢同其悲欢。如果把巴金与他的同时代人之间的故事综合起来，即使不能直截了当地把它称作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大悲剧，也总该是一本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录。

在20世纪的曙光刚刚出现在中国大陆的西南方时，祖祖辈辈长期受封建专制压迫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不少人迅速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比《共产党宣言》更早进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所谓“无政府主义”，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中，主要就是：不受拘束，要求自由，反对专制，抵抗压迫。

他们经历了清朝政府的封建迫害，和民国时代的军阀统治，幻想有个“无政府”的世界，人人能得到生活的自由，认为只要大家能互助互爱，各自有献身精神，理想就能够实现。他们从来没有严密组织，也从来不产生谁领导谁问题，因为“无政府”三个字本身就不意味着有组织和领导的存在。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不少是教育工作者，他们大都埋头苦干，身体力行。其中曾有巴金的熟人和朋友。巴金曾以他的翻译作品《克鲁泡特金自传》影响过他们，他们更曾以自己的生活实际形象，深深感动过青年时代的巴金。

30年代初，巴金曾几次去福建泉州和广东新会看望朋友。这些朋友正在那边务工读学校，或乡村师范，他们一心想把学校办得像个和睦的家庭，寄托着各人自己美丽的理想。在闽南，他认识了曾任上海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主任陈范予，这个既是教育家又是科学家，他本是浙江人，却正在这里带领学生，通过科学实验，提高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巴金亲眼看到他从外面水潭里带回来一杯污水，放在书桌上，在显微镜下看“一滴水中的世界”。巴金在这里曾住过二十多天，与陈范予生活在一起，和他作多次长谈，并由此结下了十二年的友谊。巴金曾说自己在这里看见了无穷小的世界，也看到了无穷大的世界。因为陈范予是个切实的人，他刻苦工作，虽是个肺病患者，却以他那“以有限的余生，为社会文化、思想运动作最大努力”的约言，完成了《科学与人生》、《达尔文》、《科学方法精华》三部译著。这三部书都是作者在“胸部剧痛”和“咳嗽厉害”中写成的。而当时社会报答他的是贫穷困苦，无力医病，巴金终于在抗战期间的成都，听到了陈范予逝世的消息。

十七岁时就认识的四川成都同乡，他比巴金年长，但曾一起编印刊物，相处得很好，虽然刊物夭折，以后很少见面，但十八年后，巴金两次回成都，仍然和他谈得十分融洽。施居甫很有学识，对成都的历史与现状，尤其熟悉。同时他又乐于助人，经常为别人奔走，巴金说他有一颗“黄金的心”，但是他和陈范予患着同样的病：肺结核，而又缺乏营养，不仅挥着眼泪送走了自己已经长大成材的女儿，同时也在战乱中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贫困。巴金在他死后第四年曾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哀叹生在乱世，凡有善行的人往往不得“善终”，由此巴金感到寂寞。

当年生活在巴金周围，怀着善良的愿望，相信教育能够救国的人还有一位匡互生。他与朋友们从事教育工作，在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后，又在闽南办乡村师范，长年以身作则，开导别人，同时为学校筹措经费，又到处奔波，而自己在马路上被车辆撞倒，进了医院，连医师劝他服用的药都舍不得吃，甚至等不及病愈，就提早出院。如此热心办学，闽南乡村师范最后还是被省教育当局勒令停办。上海立达学园却又在 1932 年在“1·28”淞沪战火中被日寇炸毁，当他千辛万苦，想尽办法把学校重新建立起来后，在当年年底，匡互生就患肠癌去世，也只活了四十二岁。

这些带着美丽的理想，以献身精神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他们的形象曾使巴金深为感动，并写过一些赞美的文章，但这些人不少已在贫病中离开人世，活着的通过冷酷的现实生活，和抗日战争的炮火，也大都像巴金那样对原来的信仰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意识到幻梦和现实有所分别，人道主义的理想，还需要有一种现实力量来保证，这就是自己的祖国。没有自己的国家，只能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与宰割。

由此他们大都成了爱国主义者。在这些人中间，当年在福建泉州黎明中学担任数学教师的叶非英，是巴金在认识陈范予后结识的朋友。他曾被巴金称作“耶苏”。因为他对自己实施“苦行”，平时生活非常刻苦，连患病泻血也不医治，节省一切费用为别人服务。巴金为他捐书捐款，他都把它移作为贫困学生学杂费用。巴金曾称赞他“有着病弱的身体，但是他却在做着一个健康人的工作。他将永为我的敬爱的朋友。”叶非英在新中国建立后曾参加民主党派，在广州市第十四中学任教，并当选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代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7月又被作为“无政府主义反革命分子”论处，送农村劳动教养据说他在劳动中十分认真，有人劝他说，“粮食不够，吃不饱，身体虚弱，你还这样卖力气去劳动，不怕送老命么？”他说：“死了，就算了”。不几天，就因吃薯藤腹泻，没有及时送医院，死在石井农场。直到1983年，因肃反条例并没有以历史上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而论罪这一条，由广州市公安局把1958年7月原决定撤销，对叶非英作了平反，但叶早在他五十几岁时逝世。到80年代，巴金在谈到自己早年曾写文章，称颂过这些朋友时说：“他们信任的梦想，把四周的一切看得非常简单。他们甚至相信献身精神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我写了那些夸张的、赞美的文章，鼓励他们，也安慰自己。今天我不会再做那样的梦了。但是我对他们的敬佩的感情，几十年来并没有大的改变。”

巴金在20世纪初期，结识的这些朋友，当然，只是巴金同时代人的一部分。巴金一生中与他们有着更多更深友谊的人，则是在三四十年代中间，那些和他几乎同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们。这些人在当时就短命离世，与从事教育

工作的陈范予、匡互生一样死于贫病，没有能够发挥更多才能的，至少有散文家缪崇群和小说家王鲁彦两位。这两人与巴金中间确有过食则同桌、睡则同床的友谊。巴金在1931年就认识的缪崇群，当时他正在南京编一本文艺杂志，巴金曾是这本杂志的写稿人，缪崇群热情约稿，而又热情阅稿，巴金每次发稿，总听得到他老老实实的读后感，虽然后来缪不再编刊物了，而且从南京迁居北京，但他们从此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两人每次相逢，总必披肝沥胆地坦率相处，而且长期通信，沟通思想，抒发友情。抗战期间，虽各自为工作为生活奔走，但不论在广州，在桂林，在重庆，仍都联系着创作友谊，有过几次相遇共游，还曾向往在战后能够有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与几个有共同志趣的朋友，在一个出版社或一个编辑部里，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但是就在抗战胜利前夕，巴金却在报纸一角看到用小五号字排的一条只有三四行字的简讯，知道缪崇群在重庆因患肺病逝世。留下的是九本洋溢着生命呼声和求生意志的散文集。巴金怀着悲怆的心情，从外地赶到缪崇群墓前，只看到一堆新土和两个纸制花圈。朋友们说缪为了不麻烦别人，自己病重仍一声不响，致使临危也缺乏人照料，就这样悄悄地走了，他的妻子也早在几年前病故。

小说家王鲁彦比缪崇群还早一年逝世。他同样死于肺结核。他也是巴金在闽西泉州黎明中学认识的一个朋友，比巴金的年龄稍大几岁。他不久就离开教育工作，从事文学创作，写的小说思想深沉，笔调老练，充满了对人间的爱，在读者中的影响，与当时的巴金、老舍齐名。他在抗战时期创办的《文艺杂志》，很有影响，虽然战时物资缺乏，编辑工作困难很多，自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他仍不断花费心

血，并坚持写作，以致肺病加重，最后连喉咙都哑了，还与外来的各种干扰相抵抗，即使在各方面碰壁，也不屈服，终于在贫病中被死神夺走了生命。巴金和他相交十多年，虽然分离的时间总比聚集在一起的时间多，但他们两人不但在福建，还确实在上海，在桂林，都有过经常相叙的机会，尽管巴金在王鲁彦脸上不太容易看到他的畅快笑容，但他们之间仍十分亲近，相互十分理解。巴金知道鲁彦家中有一大堆儿女，他身上生活担子实在太重了，巴金每每为自己无法帮他分忧而感到不安。鲁彦、缪崇群死后，巴金有时不免从这些友人的结局看到自己的未来。

就在王鲁彦、缪崇群、林憾庐等人在内地因生活的不安定，个人经济收入的微薄而在贫病中短命死亡的同时，巴金的另一个朋友陆蠡，在上海遭受到更突然更悲惨的结局。

陆蠡以他清澈如水的散文作品，在战前就与丽尼、何其芳、李广田等几位散文家在我国30年代中期文坛上并驾齐驱。他还与巴金、丽尼两位共同分担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作品的翻译工作。他也是巴金在闽西认识的朋友，后来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同事。抗战开始，书店负责人相继离沪，留下巴金、陆蠡等三四个人维持，不久，巴金也再次去内地。上海结束了“孤岛”时期，敌人进入了租界，书店被抄去两卡车书，陆蠡前往论理，据说因他说话态度强硬，明指汪精卫是汉奸，他们的“大东亚战争”必将失败，敌人就把他关押起来，从此不曾回来过。只有一个和他关在一起的人出狱后，曾把陆蠡的一件大衣送了回来。当时陆蠡新婚才一个半月，但从此再也看不到他的影踪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巴金远道回沪，别的事情不干，首先向留守书店的另外两个同事了解陆蠡被捕经过，回答的就这么几句。巴金痴

想他在战后能有一天忽然看到陆蠡在什么地方出现，但是几个月后才终于绝望了，直到 1951 年上海有一家报纸记者写了一篇通讯《日寇杀害了我们的优秀作家陆蠡》，陆蠡的浙江家乡有关单位才写信给这家报社记者，希望他提供更多有关陆蠡材料，以便追认他为烈士，记者只好写信求助于巴金，巴金为此写了一封长信，并把他自己和他的几个熟人写的有关纪念陆蠡文章寄给这个记者，记者把这些都转给浙江有关单位，陆蠡家乡这才追认陆蠡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

巴金和他的朋友们为抗日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不是几句话能够讲述清楚的。他们为这场保卫伟大祖国的战争，不仅在各条战线上有千辛万苦的劳动，而且还直接或间接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为推翻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要求人身的民主自由，进行艰苦的斗争，巴金和他的朋友们对也有一致的向往，也曾付出同样的心力，流过汗，流过血。他们不仅办刊物，写文章，发表作品，与各方面进步舆论遥相呼应，而且还有不少人直接参与解放战争。在巴金主编的“文学丛书”中出版过书的作者里，就有不少人投奔解放区。巴金在 30 年代初期就在北平结识的曹葆华、何其芳，就是其中两位。当然巴金的更多朋友仍和巴金一样，是在上海，在北平，在南京，在四川，在香港，在各自的原来居住地区，期待着未来的日子到来，包括与他友谊时间最久相知最深的一些朋友们，如沈从文，如丽尼，如靳以，如曹禺，如老舍，如李健吾，如师陀，如唐弢，包括目前还健在的萧乾、柯灵、王西彦、王辛笛等人，无一不心无二用地睁着眼睛等待天明，等待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来到。

不幸的是许多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1949年6月全国文代会在北平召开，巴金见到文艺界许多朋友，却未曾看到过去一直被自己认为“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助人”的沈从文。沈是巴金1932年在上海认识的。早在1928年巴金在法国时，就听胡愈之几次提到过沈的名字，原来在当时沈就已发表过不少作品，享受到各方面对他小说的称颂。在相互认识以后，巴金曾去青岛看望沈从文，当时沈还在大学教书，巴金来到，他就把自己屋子让出来，让巴金住在沈家里写文章。第二年沈从文到北平从事编教科书工作，并与张兆和结婚，还为天津《大公报》编文艺副刊。巴金去看他，这次他让巴金住在他的书房里，书房虽小，却很安静，由此巴金得以在这里顺利地进行写作，同时也为从文编的刊物写了一篇散文，他亲眼看到从文怎样细心负责地用毛笔在他的原稿上，把巴金用钢笔写的不够清楚的字迹，改得一清二楚。沈从文在当时还在天津《国闻周报》上写连载作品《记丁玲》，既替读者讲话，又抒发自己对丁玲的感情，因丁在几个月前被反动派逮捕，沈对丁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这部作品，巴金因赵家璧要求，曾把它转给他，让他作为“良友文学丛书”的一部作品出版，但因形势恶化，一时竟无法排印，直到一年后，经向“图书审查委员”疏通，才准许出版，但已被大量删节，还用了许多××，作品明显受到损伤。巴金还记得当年沈从文曾为丁玲的恢复自由，作过呼吁，并到处奔走，期望能得到引救，虽然从文尽了最大的心力，但都没有用处。巴金与沈从文在有些问题上则常有不同的看法，有时还有过相互辩论，但在感情上从不因此受到影响。比如巴金写的小说《沉落》，批评周作人一类的知识分子，沈从文就不同意，认为那是由于巴金对周不理